

“飞吧，萧红！  
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  
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  
谁也捉不住你。”

# 萧红传

[日] 平石淑子 著  
崔莉 梁艳萍 译



# 红 传

[日] 平石淑子 著  
崔 莉 梁艳萍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萧红传 / (日) 平石淑子著; 崔莉, 梁艳萍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300-25032-8

I. ①萧… II. ①平… ②崔… ③梁… III. ①萧红  
(1911-1942)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5725 号

## 萧红传

[日] 平石淑子 著  
崔莉 梁艳萍 译

Xiaohong Zhu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 × 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2.375 插页 2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7 000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萧红（1911—1942），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近郊的古城呼兰县，是一位在鲁迅的支持下走上文学道路的女性作家。在不足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萧红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细腻的描写而创作的作品至今仍为众多读者所钟爱。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喜欢她的原因不仅仅缘于写作。

萧红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关外）扶持的伪满洲国触发了萧红的民族意识，促使她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然而，为了继续创作活动，萧红被迫离开故乡东北，流浪在抗日炮火纷飞的中国内地（关内）。为了反抗传统封建家长制的束缚，萧红曾离家出走，这使她成为当时少有的独立女性的典范。萧红这种先锋的性格，使她终生未能从苦难与考验中解脱出来。萧红在大约十年间先后与三位男士同居，与其中两位男士感情破裂，据说与最后那位男士的生活也未必幸福，这足以表明她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是多么严峻。可是，这种深刻的苦难也磨炼出她敏锐的观察力，成就了她的独特的写作风格。此外，萧红苦难生活

的背景，即抗日的历史实存与中国旧体制（封建家长制）社会根源的存在，使得她的作品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获得普遍的共鸣。因此，全世界的女性研究者如今将目光重新转向了萧红。然而，也正是这种普遍的共鸣，使得笔者难以赞同迄今为止世人对萧红的评价。

呼兰的萧红家老宅被改建成为萧红纪念馆，在这座纪念馆前，矗立着一尊萧红的汉白玉雕像。雕像中的萧红凝视远方，仿佛正在深思。这座雕像是何时，经由怎样的原委，由谁来创作的，都不得而知。它的出现，正是对萧红研究状况的真实写照。雕像中萧红的姿势是在现存照片中从未出现过的，面孔在笔者看来也宛若旁人，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头脑中塑造出的一个名为萧红的女性形象，它被打上了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印记。毋庸置疑，由于笔者与制作这座雕像和认可这座



○ 萧红纪念馆（老宅）前的萧红坐像。

雕像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中，对其感到难以接受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问题是，这座雕像可能会被视为迄今为止关于萧红研究的某种定论。让笔者担心的是，在今后的日子里，它也可能会左右人们对萧红作品的理解。换句话说，这座雕像会将萧红的形象绝对化，导致人们对萧红的创作态度、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理解一元化。这样一来，雕像将不仅是一座单纯的纪念

碑，而且将成为一个神圣的偶像凌驾于读者之上。

萧红雕像的出现，印证了人们对萧红的喜爱，而这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萧红是一名女性。这也是令笔者感到难以认同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当然，笔者无意否定萧红的苦难与其女性性别关系密切。对于唯其是一名女性，才必须经历的众多苦难，作为后辈的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分析与理解，才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是，人们将萧红理解为打倒封建家长制的工具，是否有些矫枉过正呢？换言之，一直以来，为了强调封建家长制的罪不可赦，夸大了萧红作为被害者的一面。而且，这其中也隐含了不论男女，人们对女性持有的各种态度，以及在旧有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女性形象的认知与期许。这更进一步说明封建家长制这一社会历史权力是如何强大与根深蒂固。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是否可以将萧红这一活生生的女性幽闭于白色的雕像之中？笔者眼中的萧红是一个与我们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既有善行，也会犯错的人物。或许正是因为笔者与中国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才会有这样的理解。建立在汉语这一外语阅读基础上的我的见解究竟是萧红的本意，还是误读？笔者对此也颇感担心。不过，正是因为尊重萧红的作家经历，希望她能够更为广泛长久地被人们阅读，所以才会有对萧红的各种各样的理解吧。

对于拥有不同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海外读者而言，要掌握理解作家及其作品最有力的工具，历史的、社会的背景自不必说，还要具体追寻作家自身的人生轨迹。目前为止。由海外研究者完成的完整的萧红论只有葛浩文（H. Goldblatt, 1939—）的《萧红传》（*Hsiao Hung*, 1976）一部作品。这部萧红传记以精心搜集的资料与作品论为主干写就，被誉为此后在中国盛行的萧红研究的先驱之作，获得高度评价。

然而，这部作品完成距今已有近三十年<sup>①</sup>的岁月，在这期间又有诸多新资料与新研究问世。笔者试图对其进行收集整理，希望通过对这些材料和作品的分析，尽可能客观地了解现实中萧红的经历。

序章“对萧红评价的变迁”通过整理关于萧红的前期研究资料，试图厘清萧红在人们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第一章之后将萧红的文学活动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部分，对照事实，对其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进行分析，进而弄清萧红的精神足迹。终章“萧红的作品世界——注视‘远离抵抗的现实’的目光”将对萧红十年来的整体创作活动进行总结。附章追述了关于萧红的死和死后的迁葬问题。

在本书执笔过程中使用的与萧红有直接关系的材料收录于笔者所编的《萧红作品及相关材料目录》（『蕭紅作品及び関係資料目録』，汲古书院，2003年1月）<sup>②</sup>中，如果能够一并参看会更好。

---

① 距中文译本出版超过三十年。——编注

② 对于《萧红作品及相关材料目录》中收录的文献，发表时间、出版社等数据原则上不予记录。但是，在论述有需要时不在此限。此时，文献的发表时间一般指执笔时间，执笔时间不明时指发表时间。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 章 | 对萧红评价的变迁 / 1

第一章 | 萧红的童年时代 / 31

第二章 | 初期文学活动 / 63

第三章 | 中期文学活动 / 109

第四章 | 后期文学活动 / 239

终 章 | 萧红的作品世界 / 325

附 章 | 萧红之死及其后 / 355

附 录 萧红年谱 / 365

主要参考资料 / 374

后 记 / 380



## 对萧红评价的变迁

对于萧红评价的历史，结合中国国内相关的历史、政治背景，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确立期（1935年—1942年）。

从成名作《生死场》（1935年12月）在上海发表至萧红去世。

第二，追忆期及从文学史角度评价的开始期（1942年—1976年）。

萧红死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第三，实证及第一展开期（1976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证研究盛行的时期。

第四，第二展开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实证研究告一段落，展开作品论的时期。

### （一）确立期

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鲁迅（1881—1936）与胡风（1904—1985）。这两人都深度介入了《生死场》的出版，并分别为其撰写了序与后记。如果说他们对该作品的感想和评价，至今依然是评判萧红的坚实基础，则并不为过。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中略）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1935年12月）

她所写的农民们底对于家畜（羊，马，牛）的爱着，真实而又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

不用说，这里的农民底运命是不能够和走向地上乐园的苏联的农民相比的：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恳恳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但这样混沌沌的生活是也并不能长久继续的。（中略）日本人为什么抢了去的？中国的统治阶级为什么让他们抢了去的？

（中略）

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

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底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迈。

（中略）

然而，我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她底短处或弱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底前面。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我想，如果没有这几个弱点，这一篇不是以精致见长的史诗就会使读者感到更大的亲密，受到更强的感动罢。

（胡风《〈生死场〉后记》1935年11月22日）

两人冷静地指出了萧红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的不足之处，同时对作品中描述的北方农民生活的“不同的世界”和生命的顽强直率地表达了他们的感动。可以说，这代表了当时上海大部分读者的心声。所谓“不同的世界”，并非仅仅因为那是一个自己从未踏入过的世界，更是因为那是一片处于侵略之下的自己国家的国土。他们认为，作品虽然存在不足之处，却在某种程度上细致地描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日本侵略这一背景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人们不向现实屈服的顽强的生命能量。这正是促使他们发出深刻感慨的原因所在，也唤醒了他们身上的民族使命感，使其必须对该作品做出某种正面评价。萧红的丈夫萧军（1907—1988）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版了一部描写抗日游击队的作品《八月的乡村》，鲁迅在为其作序时指出，此书“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1935年3月28日<sup>①</sup>)。这一评价也同样适用于《生死场》。

此外，两人都注意到了作品中“女性作者的视角”，尤其对其自然描写中所使用的丰富的表达倍加赞赏。同时，对于这部出自一位年轻的无名女作者之手、描写默默无闻的农民在大地上掀起的强有力的反抗的故事，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究其原因，萧红独特的笔致自不用说，更是由于这部作品在题材方面极大地超越了之前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

与此同时，由于二人在当时上海文坛影响巨大，他们的评价不但代表了众多读者的心声，也必将左右人们对这部作品的社会评价。可以说，他们的评价为刚刚诞生的作家萧红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 (二) 追忆期

萧红的去世(1942年1月22日)给许多亲朋好友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人们一方面为萧红作为作家的才华甚感惋惜，另一方面也对其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爱情方面与稳定的幸福相去甚远的一生寄予深深的同情。萧红为何会在远离故乡和朋友的香港孤独地结束自己的一生？人们对此推测揣度，口口相传，萧红作为社会和历史的尊贵的牺牲品再次赢得了大众的关注。不过，关于萧红的追悼活动，据说内情有些复杂。

萧红青年时代的友人，在上海时曾与萧红苦乐与共的梅林(1908—1986)这样写道：

对于这位女作家的死，在后方除看到几篇悼念她的文字而外，只有在某处开过追悼会。据来自桂林的友人谈，桂林作家本打算为萧红开个纪念会，但后来有人收到一张近似“走江湖式”的“萧红纪念委

<sup>①</sup>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所收。

员会”的草稿，大有招摇嫌疑。大家传观一番后灰心下来。

（《忆萧红》1942年）

那个时候，由于香港沦陷，很多文化人从香港来到桂林，其中有不少人与萧红有过深交。比如，胡风于1942年3月7日来到桂林。通过鲁迅与萧红相识，之后曾写《〈呼兰河传〉序》的茅盾（1896—1981）于9日来到桂林。另外，4月5日田汉（1898—1968）四十四岁生日宴会到场者的名单中，还有杨刚（1905—1957）的名字，她在做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时与萧红曾有过交流。包括为萧红送终的骆宾基（1917—1994）和丈夫端木蕻良（1912—1996）在内，桂林有这么多与萧红有过深交的人，却没有举办任何活动。

梅林说所的“某处”恐怕指的是延安。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会前夕的5月1日下午二时，萧红追悼会在延安的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大约五十名延安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参加了追悼会。会场挂着萧红的画像，主持人丁玲（1904—1986）致开幕词之后，萧红曾经的丈夫萧军介绍了萧红的一生与著作，接下来又有一些人做了发言。萧红自哈尔滨时代就相识的老朋友舒群（1913—1989）倾诉了对于萧红逝世的悲伤之情，他说：“萧红今年只有三十二岁，正当年少力壮，发展事业的时期。然而她却离开我们长逝了。”周文（1907—1952）意味深长地说：“人在生时，常多隔阂，及至死后，大家才说好。这种生前与死后的不同的看待，应该首先从文艺界加以清除。”<sup>①</sup>

丁玲在追悼会举行之前，写了追悼文。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然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

①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

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末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已经在被那批御用的文人歪曲地诠释，那末《生死场》的命运也难于决定就会幸免于这种灾难的。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不能逐击的污蔑在等着，然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毒恶，更须要毁灭的。

（《风雨中忆萧红》1942年4月25日）

从丁玲文章的基调可以推知，之所以没有在桂林举行追悼会，并非全都因为“走江湖式”的“萧红纪念委员会”。正如上文所述，有人反对与萧红熟识的胡风的解放区文艺理论，或许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追悼会之后，《文艺月报》第十五期（1942年6月15日）作为“纪念萧红逝世特辑”，刊登了萧红的短篇小说《手》及部分友人的文章。《文艺月报》是由丁玲、萧军、舒群等联名发起的文艺团体文艺月会<sup>①</sup>的会报。其中有一篇是萧红的好友白朗（1912—1994）写的文章。白朗指出，萧红在来到上海之后虽然名声大振，但是其忧郁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战火固然是促使她早逝的原因，却不是主要的原因。白朗说，是“因为，她的病，我要说是忧郁的累积”。

我和（萧——引者注）红的相识是在她和（萧——引者注）军结婚未久还是初恋的时候。每当我走进那不见阳光的小屋，就会感到一

<sup>①</sup> 文艺月会于1940年10月19日成立，每月至少集会一次。1941年元旦创办会刊《文艺月报》，由萧军、丁玲、舒群、刘雪苇轮流主编。——译注

种幸福的和谐，只能看到他们啃嚼着干了的面包，却从未看到过那因过分的贫困的迫压而显露的愁眉苦脸。（中略）慢慢地，我才得到了结论：他们的幸福、快乐是建筑在共同的事业和真挚的情爱上，绝不是贫困的手所可左右的。

（中略）

一年之后，我们侥幸地又在沪滨相逢，而且有机会生活在一起。一切仿佛都没有变样。（中略）

这时的红呢，面色是苍白的、病态的，精神也不似以往那样愉快，仿佛有一株忧郁之苗在她的心上发芽了。两个月的共同生活中，我只感觉到红那只注满的幸福之杯仿佛已在开始倾泻了。

（中略）

预料的不幸终于发生，幸福之杯粉碎了，红和军决然地分开，据传说，红竟爱上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

（《遥祭——纪念知友萧红》1942年4月10日）

所谓“并不喜欢的人”指的是之后成为萧红丈夫的端木蕻良。白朗还回忆起在萧红与萧军分手（1938年）之后，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将孩子生下，曾经在她重庆的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她说，这段时间里，萧红心事重重，而且变得暴躁易怒。

有一次，她竟这样对我说：

“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我奇怪，为什么她对一切都像是怀着报复的心理呢？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吧？那么，无疑地，她和军的分开该是她无可医治的创痛了。

她不愿意讲，我也不忍去触她的隐痛，直到我们最后握别时，她才凄然地对我说：

“莉（白朗的本名——引者注），我愿你永久幸福。”

“我也愿你永久幸福。”

“我吗？”她惊问着，接着是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这句话到现在还幽凄地响在我的耳边，它留给我以悲哀的记忆。如今，红已安息在地下了，当她与生诀别时，是否如她的预言一样呢？我无由得知，更欲问无从了！

（《遥祭——纪念知友萧红》）

白朗十分了解萧红，她认为萧红早逝的原因，除了抗日战争带来的苦难的流浪生活之外，还有其不幸的婚姻生活。这一看法无疑会影响到人们对萧红的一生及其作品的印象与理解。

绿川英子（長谷川テル，1912—1947）也曾经和萧红一起在重庆生活过，她比白朗更明确地指出，萧红忧郁的原因在于“男性至上的封建遗产”。

她和萧军的结婚，在初期，仿佛是引导和鼓励她走上创作之路的契机。原来，各有其事业的男女结合，不单是一加一等于二，要向着一加一等于三或四的方向发展才是理想。可是在他们的结合，一加一却渐渐降到二以下来了。而这个负数，其负方是常常落在萧红这一面的。自然，这也许是由于两人的性格上所酝酿的矛盾与相克，但是火上加油的仍然是男性至上的封建遗产。

（《忆萧红》1942年7月6日）

与此同时，与萧红有过交流的男作家罗荪（孔罗荪，1912—1996）和骆宾基也分别撰文回忆萧红。罗荪回忆起萧红在武昌大轰炸的第二天，与冯乃超夫人一起到他家避难的情景。当时萧红手里拿着烟，兴



奋地谈着将来的计划和梦想。但是罗荪却发现，那份兴奋中隐藏着些许疲惫。

不久，她和T君（端木——引者注）一同去了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萧红病死香港，她的才能没有能充分地发挥，她的理想更没有得到实现；一颗诗人的灵魂，一颗崇高而纯洁的心，由于离乱的时代和艰苦的环境，被埋没了。

（《忆萧红》1942年）

骆宾基强调了萧红一生的孤独和寂寞，同时又肯定了其为文学界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孤独地生活着，却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春天的一道阳光，青草发芽，树荫遮道，大地充满了生命之爱，欣欣然，仿佛向日葵得到朝阳的温暖，从满天乌云之间展开的一条晴空缝隙下。

（中略）

而萧红本身，就又仿佛山腰当中一道泉水的溪流，清澈见底，倒映着两岸的初春绿草，也有一两片云影、蓝天，闪着滴滴阳光；大部溪流又埋在树荫下，寂寞地流着，流着……却又听不到一点声音。实际上，除去水面微风吹起的波纹，又是什么也没有。

萧红就这样任凭生命之流，寂寞地流着；而给予人们，却是温暖与热情，像溪流给予人类的优美。

（《萧红逝世四月感》1942年5月）

与上述两位女作家撰写的追悼文章不同，同一时期由这两位男性作家撰写的文章中没有“男性至上的封建遗产”的观点，而且骆宾基在这一阶段还没有出现对“T君”（端木蕻良）激烈的责难态度。